



# 古都春寒早

## 毛泽东巧布奇兵，古城 北平被罩上了天罗地网

1974年4月中旬的一天，一辆红旗牌小轿车从中南海驶出，经过几条大街和几条胡同，在一家医院的大门口嘎然停住，从车里走出了一位面容清瘦的老人，在几名卫士的陪伴下，走进医院的一间病房。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周恩来。日理万机、且刚动完手术的总理今天如此匆忙地来医院病房，要看望谁呢？

病房里，一位病危的老人静静地躺在病床上。看见来人之后，他动了动眼珠，似乎在打招呼。这位弥留之际的老人就是傅作义。

周恩来靠近病床，俯下身去挨近傅作义的耳朵说：

“毛主席叫我看你来啦！说你对人民立了很大的功！”

傅作义听了周恩来的话，会意地动了动嘴唇。看上去他是想说什么，但已经说不出了。

第二天下午，傅作义带着一种对人生的满足感，离开了人世。为何傅作义如此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敬重和

高度评价呢？让我们把历史翻到 1948 年底至 1949 年初的那个岁月。

1948 年 11 月，解放战争的炮声震撼着神州大地。这是国共全面战争的第三个年头，这一年对交战双方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一年。人民解放军称其为“过关的一年”“决定胜负的一年”。经过两年多的激战，中国的军事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并步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为了争取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和一切反动势力，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在辽沈战役结束不久，淮海战役将获全胜之际，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便命令东北野战军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秘密入关，与华北野战军相互协同，出敌不意地对平、津、塘之敌形成战略包围，从而在广阔的华北战场上发起了规模巨大的平津战役。

此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亲自领导、指挥，集中了华北、东北两大野战军的主力和华北、晋绥的地方部队共 100 多万兵力，以两倍于敌的优势全线出击。但为了保全北平古都的文化古迹和北平全市 200 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决定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就是“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在平津战役正式打响之前，1948 年 11 月 9 日华北野战军攻占承德。18 日，东北野战军攻占山海关，并按中央军委命令秘密开入山海关。

11 月 29 日，华北三兵团杨成武部奉命发动张家口战役，揭开了平津战役的序幕。华北野战军按“围而不打”、“隔而不围”的原则，向平绥路东段发动攻势，并在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配合下，包围了张家口、新保安等地，切断了傅作义嫡系部队逃往绥远的通路。东北野战军主力插入平津之间，将两地的国民党军队分隔

包围，并且占领了唐山等地，防止国民党军队南逃。这样，傅作义所指挥的这一条长蛇阵的部队，被腰斩成数段，完全陷入欲战不得，欲守不能，欲逃不成的被动境地。

当时，中共中央军委认为，傅作义指挥的军队如果固守平、津、张，而不准备南逃，蒋介石就无法组成江南防线，这就可以加速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崩溃。为了把傅作义指挥的军队滞留在平、津、张地区，就地加以解决，中共中央军委便电令解放军华北一兵团徐向前部缓攻太原，改为围城休整，以免攻下太原后会使平、津方面的国民党军队感到孤立而南逃。同时，命令华北三兵团杨成武部撤围归绥，赶到张家口地区，但不是立即夺回张家口，而是吸引傅作义派兵增援；然后，协同华北二兵团杨得志部和东北野战军入关的先遣部队，把平绥路截为几段，把傅作义直属部队的主力分割包围在平绥线上。这样，既抓住了傅作义系统的军队，又拖住了蒋介石的“中央军”；既堵住了傅作义直属部队西逃的退路，又使傅作义不能舍弃其直属部队而率蒋介石嫡系部队南逃。

中共中央军委还命令中原、华东两野战军，两个星期内不在淮海战场上作最后歼灭战的部署，使蒋介石难以定下从海上撤退平、津守军的决心。此外，还命令山东解放军集中一部分兵力，控制济南附近的一段黄河，并在胶济路上预作准备，防止平、津国民党军队可能向山东海港烟台、青岛方向逃跑。还命令冀中、冀南、北岳、冀鲁豫等军区的解放军和民兵，分别在保定、石家庄、沧县、德州等地区，构筑几道阻击阵地，防止华北的国民党军队从陆上南逃。

至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布下了天罗地网，使傅作义指挥的军队完全陷入解放军和民兵的包围之中。

与人民解放军发动强大攻势的同时，中共北平地下党也不失时机采取各种策应措施积极配合，为和平解放北平创造了较好的

内部条件。“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中共中央在立足于打、准备打的同时，始终力争和平解放北平，以取得于人民于革命最为有利的战果。

北平是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长期以来，北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英勇斗争。早在 1945 年 9 月，在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的领导下，即建立了中共北平市委，由刘仁任市委书记。中共北平市委下辖 5 个委员会，领导各条战线逐步开展地下斗争。后因形势的发展，北平市委撤销，5 个委员会全部直接由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领导。

北平地下党在城工部的领导下，根据中共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积极开展地下工作。到北平解放前夕，已发展地下党员约 3000 人，党的外围秘密组织民主青年同盟、民主青年联盟约 5000 人。他们采取各种形式，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随着战况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刘仁指示北平地下党组织，大胆利用能对傅作义开展工作的各种关系，尤其是通过傅作义的亲信和亲属，直接向傅作义做工作。

地下党首先选择了刘厚同。刘厚同与傅作义关系颇深。1928 年，傅作义在奉军撤退时出任天津警备司令。蒋、阎战争中阎锡山败逃大连后，傅出任绥远省主席，后来，傅作义脱离阎转向蒋，刘厚同给傅作义出了不少主意，深得傅作义的信任。刘厚同具有民主进步思想，对形势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倾向北平问题最好能和平解决。所以，北平地下党选择刘厚同作为与傅作义谈判的桥梁，决定由崔月犁、杜任之、刘学周等人去做刘厚同的工作，再通过刘去争取傅作义。

针对傅作义在和谈问题上的徘徊、观望和动摇，刘厚同做了大量的分析说服工作。他对傅作义分析时局，客观地谈了自己的看法。

刘厚同说：“总司令，国共军政形势发展到今天，我早已料到了。我说过，政治是军事的根本，未有政治不修明而军事能胜利的。南京政府政治腐败，军政官吏贪污腐化，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实在不合乎人心，不顺乎潮流。南京政府恐怕维持不了一年半载啦！”

同时，刘厚同又分析道：“现在平津陷入重围。南下已出不去，平绥路又被切断，打回绥远去也不可能。时至今日，万不可三心二意，胡思乱想了，还是顺应人心，当机立断，设法同中共疏通渠道，进行和谈为是。”

刘厚同还针对傅作义打算依靠空援，固守北平，与城共存亡的想法，劝说道：“不能将文化古都毁在你傅宜生（傅作义字）的手里，解放军遍地而来，城是守不住的。蒋介石自顾不暇，哪有力量支援你。现在与中共和谈的资本虽远不如过去，但议和一成，北平免遭战火破坏，城内军民生命财产得以保全，是深得人心的。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政策也很明确，高树勋起义就是一个见证，你只要能接受和平起义，共产党是不会亏待你的，北平只有和平解决，才有光明前途。”

为了进一步做好傅作义的工作，及时把握其思想变化的脉搏，北平学委研究确定由傅作义的长女、中共地下党员、天津《大公报》记者傅冬菊正式出面试探傅作义的反映。

同时，南京学委负责人王汉斌还将傅冬菊的爱人周毅文（系中共地下党员）调来北平，留在傅作义身边。余涤清（北平地下学委书记）找傅冬菊谈话，告诉她：“现在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你父亲有接受和谈的可能，希望他放下武器，与共产党合作，和平解放北平。”傅冬菊对此心领神会，当即去找父亲，转达共产党的意图。傅作义很谨慎，担心是“军统”特务通过他的女儿来套他，便问其女儿：“是真共产党还是‘军统’？你可别上当！要遇上假共产党那就麻烦了。”傅冬菊肯定地回答：“是我们同学，是

真共产党不是‘军统’。”

傅作义又问：“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傅冬菊一下答不出来，只好去请教余涤清该作何回答。

余涤清明确告诉傅冬菊，就说是毛泽东派来的。得到这一答复后，傅作义表示此事可以考虑。

之后，傅冬菊便留在傅作义身边，一边从生活上照顾傅作义，一边劝说傅作义不能再与蒋介石同流。

同时，傅冬菊通过周毅之，每天把傅作义的动态及思想状况向王汉斌和崔月犁等汇报，而这些又被及时写成电文，通过地下党的电台，直接报告刘仁，刘仁再及时转告平津前线指挥部。我党能如此迅速、准确地了解傅作义的动态及情绪变化，对人民解放军做出正确的判断，下定正确的决心，进行正确的部署，起了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北平地下党还派李炳泉通过其堂兄李腾九去做傅作义的工作。李炳泉此时的合法公开身份为傅作义办的《平明日报》社采访部主任。李腾九则是傅作义的少将联络处长，高级幕僚，此人一直追随傅作义，与傅共事多年，甘苦与共，对傅作义的思想、言行无不了解。这样，李炳泉先把李腾九的思想工作做通了，再让李腾九直接去找傅作义谈。在傅作义异常苦闷、犹豫不决之际，李腾九几次相机向傅作义进言，力劝傅作义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争取和平解决平津问题。

根据上级党组织的要求，北平地下党还组织地下党员，广泛联系群众，积极开展和平解放北平运动。他们给驻北平的国民党军政大小头目邮寄和散发通令、传单，告诫这些国民党头目各安其职，不准搞任何破坏活动。北平地下党还积极开展政治攻势，进一步瓦解国民党军队，争取他们的局部起义。许多国民党中、下级军官，包括一些高级军官被争取了过来。如国民党九十二军军长黄翔，同意率全军单独起义；傅作义的铁甲总队一大队长于维

哲也答应，如果解放军攻城，发出信号，铁甲总队一大队就从前门车站攻向永定门，突破缺口，配合解放军行动。

## 战？走？和？傅作义在三岔路口徘徊彷徨一阵之后，终于把脚伸向了和谈之路

面对日趋紧张的华北军事形势，傅作义仍在思索着摆在自己面前的三条路：战、走、和。战，以 60 万兵力抵挡斗志昂扬的百万人民解放军，谈何容易；走，怎么走，能否走得了；和，怎么和，能否和得成。对傅作义来说，这三条路都充满着障碍。傅作义最终选择“和”这条路，确为形势所迫并经历了一番曲折。

1948 年秋，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后一仗开始后，蒋介石坐镇北平亲自指挥。此时，傅作义对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已有几分预感。他甚至对几个亲信流露出“罢战求和”的思想。但傅作义清楚，要使自己头脑中设想的“和”成为事实，必将面临许多困难和诸多阻力。他本人也是顾虑重重。

首先，在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之后，傅作义先任第十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司令长官、张垣绥靖公署主任，后任华北剿总总司令。他坚决执行蒋介石的“戡乱”、“剿共”政策，率领自己的部队进攻华北解放区。1946 年 10 月，傅作义部乘虚进占晋察冀解放区中心城市张家口，把国民党在华北地区的军事进攻推上巅峰。他通电全国，声称击败了聂荣臻、贺龙两部 10 万人，是“人民意志”的胜利。可是如今，蒋介石在东北一败涂地，他自己也面临危急处境，想同共产党和谈，共产党和人民会原谅他吗？是否会以战争罪犯来处置他呢？

其次，傅作义坚决执行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并有累累“战绩”，因而颇受蒋的赏识、重用。如果自己此时背着蒋介石同共产党和谈，蒋知道后一定不会放过他。搞不好不是被蒋介石的嫡系

“中央军”打死，就是被蒋介石手下的特务暗杀。

再次，多年来，傅作义给自己的部属灌输的是反共思想，如今自己来个 180 度大转弯，同共产党讲和，部属们能想通并予以配合吗？弄不好会有人开枪打死自己！

所以，傅作义私下对几个亲信说，他走和谈这条路，是准备冒“三死”来做的，即或被蒋介石抓起来处死，或被自己的部属打死，或被共产党当作战争罪犯处死。

但是，傅作义身为华北剿总总司令，早在 1948 年即已看出东北“国军”被解决后，中共军队不久便将杀进关内，自己的地盘和军队行将不保。再说他对国民党政府更是信心全失。国民党政府投靠美帝国主义，出卖国家主权，天下之恶集于一身。在东北战局危急之际，蒋介石非但不坐镇沈阳，反而为宋美龄、孔令侃囤积居奇、扰乱金融的丑闻飞往上海。抗战胜利之初，沦陷区的老百姓还想“中央”、盼“中央”，曾几何时，老百姓已深感“‘中央’来了民遭殃”！国民党已丧尽人心，怎能再幻想蒋介石实现中国独立、统一呢？因而，一向富于谋略的傅作义将军，便以战略的长远眼光，审时度势，开始在亲信、智囊中酝酿罢战求和之事。

1948 年 10 月 25 日深夜，傅作义召见政工处长王克俊，直接与王进行了一次深层次的交谈。

作为傅作义身边工作多年的处长，王克俊自然很善于察颜观色，他胸有成竹地问：“是不是谈咱们几次谈到却未深谈但还需深谈的那件事？”

傅作义点头默认，希望王克俊有什么想法，能实话实说。

就在王克俊小心翼翼，考虑着该如何说时，傅作义已急不可待地先开了口：“一些很要好的朋友，例如邓宝珊、马占山、刘厚同等；一些学者、教授，例如张东荪、杜任之、王之相等人，现在都主张和平谈判。许多有学问、有才干的人，像抗战前在绥远

狱中的王若飞，抗战初期和咱们合作共事的潘纪文、王一然、景昌之等，咱们很敬重他们，可是咱留不住他们，他们或者是回到、或者是千方百计地往共产党那边去了。最近九十四军军长郑挺锋，借口母亲病重，坚决辞职不干，飞离北平去南方了。还有一些众叛亲离的事，影响着官兵的士气。就是蒋总统本人，不也是为了宋美龄大发‘戡乱财’，竟然匆匆忙忙地飞往上海吗？”

接着，他又说：“1945年以前，抗战还没有胜利的时候，蒋介石要缩编咱们的部队，近来却慷慨地给咱们扩编队伍，还一再让咱们把察绥、平津的干部家属安置到福建后方基地去，还让咱率部去江南，就任东南军政长官，指挥全部国民党的军队。可是，他对曾经竭忠报效于他的张学良、卫立煌，是何等的心狠手辣？！”

他长叹一声：“我们不能再盲目地信赖他了！”

后来，他们的谈话便集中到一个问题上：“前途何在？”而得出的结论却是：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这是必然的。古人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时至今日，该认清形势，走自己的路了，趁着现在还有实力的时候，及时进行和谈，才会不至于成为国民党失败的殉葬品。

最后，傅作义和王克俊商定：环境极为复杂，必须有明有暗，有真有假，施展纵横捭阖的全部解数，才能实现大转变。

促使傅作义走上和谈之路的因素，还有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与蒋介石之间所存在的矛盾。

蒋傅矛盾可谓由来已久，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嫡系与非嫡系、“中央军”与地方势力、正规军与“杂牌军”之间矛盾的必然显现。傅作义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排除异己、出卖民族利益等久已不满，两人间的矛盾也日益表面化、尖锐化。

1946年秋冬，蒋介石命令傅作义派他的暂三军等部赴东北作战；派第三十五军等部向保定一带南下捕捉解放军的有生力量。结果是：暂三军军长安春山出关不久便缩回关内；第三十五军在冀

中涑水以东被围，蒋介石嫡系部队十六军、九十四军却不积极配合，以致三十五军的三十二师被歼。第三十五军是傅作义赖以起家的老本，遭此重大打击，使他好几天都神情恍惚，对蒋介石的调遣令和“中央军”的行为十分不满。

1947年12月，傅作义被任命为“华北剿总”总司令，指挥兵力达60余万人，所管区域为冀、察、热、绥和山西的雁北、陕北榆林的一角，外加北平、天津，号称华北五省二市（其实应为四省二市，因山西的阎锡山曾做过傅的多年顶头上司，不便指挥，傅便电请蒋介石将山西划出其职权范围之外，得到蒋的批准）。

1948年2月，傅作义主持召开“华北剿总”会议，研究军事行动。会上，他提出总司令有权调遣使用整个战斗序列的部队。本来这该属于常识性的、不成问题的问题。可是，“华北剿总”副司令兼北平警备总司令、国民党军统特务头目陈继承，自恃是委座派出的“监军”，对傅作义的说法公然表示反对。他说，对“中央军”的调遣必须通过他，凡属他的部队，惟有他一人才能调动使用，任何人不得染指；至于对傅作义直属部队的调动，他却要过问。

陈继承的态度骄横跋扈，已把“副总司令”的权力高高凌驾于“总司令”之上，连“中央军”的李文、石觉等高级将领也都感到有些过分。身为总司令，傅作义岂能容忍，当即表示决不同意陈对自己权力的限制。

会后，傅作义向蒋介石连发三封电报，坚决要求辞职。蒋介石自然不准，且每每都是复电竭力挽留，并给予一番安慰。

后来，蒋介石看傅作义继续请辞，方对傅说：“如能推荐一位像你一样的优秀将才，作为对你的替代，方可接受辞呈。”

傅作义当即应答：“陈继承副总司令可以替代，他已掌握军事、警备、人事、调动等方面的大权，完全可以胜任。”

直到这时，蒋介石方才意识到，傅作义的辞职是由陈继承引

起的。鉴于目前在华北，只有傅作义能支撑起局面，蒋介石不得不撤掉陈继承。于是，蒋介石致电傅作义，除表示安抚外，还允许傅作义推荐副总司令人选。

为显示自己出于“公心”，并无排斥“中央军”之意，傅作义提名“中央军”李文兵团的副司令官周体仁接任。无奈之下，蒋介石只好批准，并将陈继承调离“华北剿总”，一场风波方告平息。

不久，傅作义又以坚决的态度，迫使蒋介石撤换了北平市政府民政局长、军统另一特务头目马汉三，社会局局长、中统特务温崇信等，削弱了国民党在北平的特务势力。

1948年7月5日，北平参议会会议长许惠东利用陈继承埋在傅作义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由青年军二〇八师扩编的八十七军，在东交民巷殴打参加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东北流亡学生，打死学生8人，打伤36人；还包围学校，阴谋逮捕进步学生。

“七·五”血案激起了北平人民的义愤，全国各地学生、各界人民群众，也开展罢课、罢市等活动，声援这一惨案的受害者。

傅作义眼看事情闹大，只得亲自出面接见学生代表，并且流着泪向学生们表示：“这件事一开始，我就再三指示不许打人，不许携带枪支维持秩序，不料仍然发生这种不幸，实在令人心痛，我身负华北重任，应负主要责任。”同时，他还当众指定专人做好善后处理工作，安葬死者，医治伤者，发放钱粮，成立临时中学，安置好东北学生的食宿、求学问题，并且答应处理肇事者。为此，傅作义专门给蒋介石去电自请处分，并引咎辞职。蒋介石知道“七·五”血案和学生的抗议行动是八十七军和中统、军统特务引起的。所以，复电表示挽留，并同意傅作义的应急措施。傅作义趁机将八十七军调离北平开赴唐山，蒋介石也只得批准。

## 和谈秘使，三次走出 古都北平的城门……

在存亡危急的关键时刻，作为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的傅作义，的确是心态万千，内心矛盾重重。甚至，他还做出一些令人费解的决策：一面竭尽全力出兵西线，援救被解放军包围的郭景云三十五军，一面又派出和谈代表出城谋求和平。这说明，此时傅作义采取的仍是打谈相结合的两手策略。

傅作义首次派人出城谋求和谈的时间是 1948 年 12 月 14 日。此次行动极为机密，从酝酿到行动，只有傅作义、王克俊、李腾九 3 人知道。

12 月 12 日，傅作义把李腾九找到自己办公室。这时傅作义已知道李炳泉的真实身份，便通过李腾九打听李炳泉的近况。李腾九明白总司令的意思是要知道中共方面对和谈的最新信息。

起初，李腾九将李炳泉的北平地下党代表身份透露给傅作义时，傅曾微露吃惊之色，对李炳泉希望与他会晤一事未作正面直接答复，但却关照李腾九：“和谈的事要妥善研究，你可以继续联系 无论如何要注意李炳泉的安全 必要时可让他住到你那里去。”

今天，傅作义特地向李腾九问起李炳泉，李腾九对傅的用意当然是再清楚不过了。于是，他回答说：

“李炳泉希望能和总司令面谈，他早言明他可以作为正式的中共北平地下党代表，向总司令述明中共的政策和具体要求。他还说我方也可以派代表随同他去解放区与中共有关领导直接会谈。”

听后，傅作义未开口，沉思一会，让人找来了王克俊，并对王说：“上次咱们谈的那件事，现在马上就要进行了，联系、出城人员的接送等一切事项由你负责。这事除咱们 3 人外不得让别人知道。”说话间 伸手指了指李、王和他自己 尔后又对李腾九说：

“你让李炳泉到我这来一趟，我有话对他说。”

不久，当李腾九领着李炳泉来见傅作义时，傅作义老远就伸出手迎了上去：“欢迎你！”李炳泉则开门见山地告知傅作义，他是受中共北平地下党的派遣而来的，他说：“欢迎傅先生做出决断，进行和平谈判。”并对傅作义询问能否由他的代表同李一起到解放区去见中共方面的领导，作了肯定的答复。

傅作义很快就和王克俊、李腾九商定，《平明日报》社社长崔载之作为和谈代表，加上报务员、译电员和司机共 4 人组成和谈小组。

12 月 14 日和谈小组与李炳泉一行 5 人乘坐吉普车由王克俊、李腾九把他们从广安门傅系部队孙英年的防地送出城外，驶往河北平山。和谈小组的使命是谈判张家口以及平、津、塘全线和平解决。

和谈小组启程后，傅作义让李腾九佯装生病，携带电台住进医院，与各方隔绝，专门与崔、李所携电台联络。

然而，沿途很不顺利，到处有哨兵，处处受阻拦，汽车开至涿县境内时，被当地解放军驻军拦截，后经过商量和请示，才让他们去蓟县与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联系。他们未到平山就只好折回北平了。

12 月 15 日清晨在朦朦雾霭中，王克俊又亲自乘车来到西直门外，将崔、李送上汽车，并祝愿他们能够顺利到达目的地。直到汽车已驶出很远，王克俊还在望着渐渐为雾气吞没的汽车影子。

和谈小组的汽车在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的驻地受到阻拦。纵队司令员贺晋年、政委陈仁麒接待了崔载之和李炳泉。崔、李以急切的心情告诉这两位将军，傅作义急于要和解放军和谈，希望他们放行。贺、陈当即将此情况电报平津前线司令部。前线司令部接电后，一面转报中央军委，一面电令十一纵队派人护送崔、李到司令部来。中央军委 16 日向前线司令部通报了中央意图。

崔载之、李炳泉到达前线指挥部后，罗荣桓政委让参谋处长苏静负责接待。为了不暴露前线司令部的的位置，会面地点选在附近的蓟县八里庄村西头的一座房子。

16 日下午，苏静与傅方代表进行了初步接触、交谈。这不是正式谈判，双方都在试探，都需要摸底。

12 月 19 日，刘亚楼参谋长来到八里庄，与傅方代表进行了交谈。刘亚楼说明了全国形势与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意图，明确表示，不能同意傅作义提出的建立华北联合政府的主张；只能给傅作义留下两个军；傅作义必须把蒋系部队的军师级头目逮捕起来，然后宣布起义。

崔载之对此未作表态，只是传达了傅作义的一些想法：

（一）傅作义对谈判很重视，早有考虑，确有诚意。但也有顾虑，他要求在绝对保密中进行，以不使“中统”、“军统”特务闻讯进行干扰破坏。

（二）傅要求解放军放弃对南苑机场的控制，这样他可以得到蒋介石一些飞机。

（三）傅还希望解放军放回被围困在新保安的傅系三十五军，以加强在北平城内的军事力量，制约城内的蒋系军队，必要时，可搀杂解放军一块进城。

（四）傅提出通电全国，宣布实现和平解决，尔后成立华北联合政府，他参加联合政府，军队归联合政府。

显然，双方的条件距离甚大。崔载之用电台向傅作义报告了中共方面的要求。傅作义当即回电：城内中央军的兵力比我的部队多十几倍，逮捕蒋系军师两级军官没有把握，实行此方案困难。别的傅未作答复。

谈判搁浅。但此时，傅作义的命根子三十五军在新保安全军覆没，军长郭景云战死。形势急转直下，崔载之给傅作义连发几个电报，劝傅要考虑解放军的条件，放下武器。否则，谈不成也

谈不下去，请傅慎重考虑。

12月23日，崔载之从电台中收到傅作义致毛泽东的电报，全文如下：

毛先生：

（一）今后治华建国之道，应交由贵方任之，以达成共同政治目的。

（二）为求人民迅即得救，拟即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进全面和平统一。

（三）余绝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

（四）在过渡阶段，为避免破坏事件和糜烂地方，通电发出后，国军即停止任何攻击行动，暂维现状。贵方军队亦请稍向后撤，恢复交通、安全秩序。细节问题请指派人员在平商谈解决。在此转圜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责余为难。过此阶段之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望能顾及事实，妥善处理。余相信先生之政治主张及政治风度，谅能大有助于全国之底定。

当天，平津前线司令部将此电文发给了毛泽东。

12月25日，中共中央宣布蒋介石等43名罪大恶极的头等战犯名单，傅作义的名字也被列在其中。在宣布战犯的同时，还发表了一篇短文，指出：像傅作义这样的战犯不惩罚不可能，减轻惩罚是可能的，其出路是缴械投降，立功赎罪。

傅作义实在难以理解：为什么在这时候把我置于这样的地位？他对其同僚感叹：“这样做不违背中共的宽大政策吗？这一定是中共一批青年干部干的，毛先生一定不知道。”

第二天，他就叫李腾九发急电，命崔载之立即返回北平。电文为：

“总座能为国家为人民及保全平津文物与工商业基础，毫无任何政治企图，其意亦即帮助成功者速成，而不是依附成功者求自己发展。因之，如果缴械亦可先从自身缴起，吾兄迭次来电意见均甚好，希即返平面谈。”

苏静得知此讯后，即刻将情况报告前线司令部。司令部立即以林彪名义同时发了两个电报，一个是发给苏静的：

“望嘱傅之代表稍待 然后再回北平。”

另一电是发给中央军委的：

“傅之来电转上，该电似非真意，似另有企图，我们拟准其回去，并告以傅本战犯，现如能下令缴械，则对其本人及其部属可以优待，军委有何指示，盼复之。”

可是，一切都未来得及，崔载之就已经走了。李炳泉和报务员、译电员仍留在八里庄，电台也留下了。

事实上，这次和谈没有成果，只能算是一次接触，彼此对对方的要求和意图，倒是有了一些了解。

第二次出城时间为 1949 年 1 月 6 日。这天清晨，天气很冷，干巴巴的风带着削人皮肉的哨音从地面上掠过，干树枝儿发出没有节奏的声响。西直门，这座经过几个朝代风雨沐浴的城楼，今天似乎显得格外清静。又是从这里，王克俊第二次送走傅作义的和谈代表，他们是周北峰、张东荪。

张东荪是傅作义的老朋友侯少白举荐的。傅作义本来就想请第三方面的党派和知名人士出来斡旋，作为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燕京大学教授的张东荪正是他理想中的和谈人选。约见张东荪时，傅作义提出，打算派他的土地处处长、原山西大学教授周北峰陪同张先生去中共方面走一趟。张东荪知道周北峰曾和中共方面打过多次交道，当即表示同意，并说：“既已和中共方面有了联系，

事不宜迟，近日就可启程。”

随后，傅作义又约见周北峰，告知他和中共方面的接触情况，希望周陪同张东荪出城，再去代表他和中共方面谈判；对于进行接触的情况，可随时用留在那里的电台告知和交换意见。傅作义还反复强调，此事一定要保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

1月6日清晨，王克俊先用车去接周北峰，尔后两人又一同到李阁老胡同张东荪寓所。王克俊介绍周、张两人认识后，便交待了两人此行的目的。

谈话时，一个青年人闯入并自我介绍说，他叫崔月犁，是半小时前来到张先生家的。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听说张东荪、周北峰两位先生要出城商谈和平解放北平之事，特派他来表示欢迎。

崔月犁又说：“对于这次行动，中共方向已做了妥善安排，出西直门后可直奔海淀那里有人接待。”他还叮嘱：“通过火线时，就摇晃一面小白旗，解放军便知道你们是和谈代表了，会有人出来接待的。”

走出西直门后，按照崔月犁的交代，张、周乘车向海淀方向驶去，沿途顺利通过前沿哨卡，后由解放军前线一指挥所的干部将他们送到西山脚下的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部。

程子华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告诉两位代表：“本来准备请你们今天从海淀去平津前线总部的，可时间已经不早了，还要绕道西山脚下，路也不大好走，今天就请你们在这里休息一晚，明天一早上路，下午即可到总部。”

张东荪、周北峰表示同意，在西山脚下歇了一夜。次日早饭后，便与程子华握别，下午4时就到了蓟县东南的八里庄。

李炳泉这时以中共工作人员的身份，出面接待他们。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特地由平津前线司令部乘车前来欢迎。

谈判前夕，中共中央、毛泽东又电示平津前线指挥部，再次明确了谈判的基本方针：只要傅作义让我们和平接收平津，允许